

副刊編輯的四充和不充

胡汝森



報紙是傳播新聞，溝通大眾的媒體，而且是國家最重要的公器之一。從報紙內容的品質，約略可以看出社會盛衰的趨勢；從報紙的風格，也可以看出編輯和記者的學格水準。

準。

抗戰初期，身在行伍，部隊裝備不全，弟兄營養不足，對當時世界頭等強國的日本皇軍抗戰，屢戰屢敗，連續「轉進」。可是，人人對我國必然獲得最後勝利的信念，從未絲毫動搖。以弱抗強，使大家堅卓不移的因素固然不止一項，其中最主要的，是當年的報紙不斷給我們鼓勵、啓發，而且時時喚醒國民——包括新聞從業人員本身在內——要認清救亡圖存的使

命感。那時，大公報、中央日報、掃蕩報、益世報等和一些地方發行的報紙，經常刊登許多發揮高度輿論和社教功能的社論、專欄文章、副刊文藝……直到如今，閉目追憶，一些鼓舞性的傳播和召喚，猶在眼前和耳際。

從當年報紙刊載的各種影響深潤的文章，即可以反饋報刊編輯和記者的專業學養，水準既高，目光亦遠，而又確實能肩挑益效廣泛的文化使命。

拿三十多年前新聞工作人員的實踐成效作為尺度，來衡量今天報業人員的學養見識，應該深思與檢討之處，實在不少。恕我在此以讀者和誼友的身分，提供一些意見。正如「聯副」「啄木鳥」專欄標榜的：

「病了的人社會需要直言的人」，我在此不妨做一做直言的「啄木鳥」。

然而，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說起。爲了避免對整個報紙獻言的大而無當，不如讓我只向副刊編輯「直言」吧！

直言必須依據事實，無奈各報副刊的是是非非太多，任何人都無法貪多舉例。因此，只能集中一兩家報紙，就個人記憶所及的事例，作爲引述的根據。

副刊編輯的四充

一、準備充足：「聯副」在今年元旦推出「一年來的我國文壇」，目的是對去年一年，我國文壇多采多姿、各方面長足進步的事實，做一通盤的檢討與認知。這個標題的構想非常好。可惜編輯對這個大題目準備不充足，致使它的實踐成效不佳，令讀者很失望。六位執筆人，下筆很少能周全切題；因此，使個這引人入迷的專題，終於變成了題響文癩的副刊「室內裝飾」。

元旦的頭一砲，是洛夫先生的「詩壇風雲」。全文冗長而缺乏說服力，自我標榜，乘勢向顏元叔先生

報一箭之仇。洛夫先生圍剿顏元叔，運用「詩海」戰術：「引起詩壇廣泛的反響……首先發難……挺身應戰……如響斯應……殺出兩支翻案義軍……」這是正規軍與義軍分進合擊的戰鬪方法，蓄意要把顏元叔先生「戰」、「殺」個片甲不留。洛夫先生在這一場「戰鬥」中，充滿了「楊雄式的英雄氣概」。何謂楊雄式的英雄氣概？且看施耐庵的描寫：

「……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。……前面兩個小牢子，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，一個捧着若干緞子采繪之物，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劊子。……人都稱他病關索楊雄。……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。原來纔去市裏決刑回來，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，送回家去。……」（「水滸傳」第四十三回）

施耐庵寫楊雄有這麼多小牢子伺候，在斬殺「江洋大盜」或「英雄好漢」之後，衆相識掛紅賀喜的迎送，好不威風！

洛夫先生的「詩壇風雲」，準備亦不充足，取材有偏漏，對去年一年的回顧與檢討不夠，情緒與恩怨過多。趙天儀先生在「笠」詩刊（六六、一〇、一五

」中，發表了一篇「我們需要怎樣的批評？」提到：「像顏元叔先生的批評……他居然也看到了那麼多的流弊，語氣雖嫌過火，但未嘗沒有中到要害，這是我們創作者需要自我反省的地方。」顏元叔先生與洛夫先生等人有什麼宿怨，外人不得而知，但是，顏先生對我國詩壇，批評時「語氣雖嫌過火」，但他略盡「啄木鳥」職責的實踐成效，無端端被抹殺了，總是一件遺憾的事。

同樣，「人間」副刊在七月下旬舉辦了一個「臨時湊成」的「中國歷史傳統與現代化」座談會，金耀基先生臨時「又一次被說服」來主持這個熱鬧的會談。本來，討論專門學術性的大題目，諸如「中國歷史傳統與現代化」，並不是副刊必然的任務。這種座談之後得不到明確創新的結論，本是讀者意料中的事。但是，編輯在座談之前，並沒有充分準備，以致連一個主持人，都要臨時拉差來主持，那就有點出乎讀者期望以外，似乎不足為訓了（註一）。

二、充分惜才：熱心的讀者易得，好的作者難求。身為副刊編輯，對於作者的文才，尤其是左手能散文，右手能現代詩的高才，應該十分珍惜才對。

一位惜才的副刊編輯，一定會盡力婉勸余光中先生，不要發表「狼來了」那篇文章。

余先生的「狼來了」，落筆雖然躁狠，但仍可看出他是出於善意的。余先生可能極端厭惡別人妄評他的作品，更對「戴帽子」有着無限反感的潛在意識，一時衝動，才會寫出如「狼來了」這般驚人的文章。

從洛夫先生的「詩壇風雲」裏，才知道余先生的「狼來了」是原來針對某詩刊而仗「義」執言的。余先生一向好創造浪漫的詩意名詞，諸如：「左手的繆思」、「半票讀者」、「新鮮人」等等；無論如何，「抓頭」這類名詞，却是要不得的。它的報復意識粘滯，浪漫不足，情緒有餘。僅僅爲了澄清某詩刊的「污染」，何必如此大動肝火，拿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呢？

李敏勇先生說：「寫『狼來了』也許是善意的。不過，善意得危言聳聽，無的放矢，不是文壇之福。這種文章，也許是善意的，可是反而容易被人誤解是故意的、不誠意的。」（「笠」詩刊六六、一〇、一五）余先生發表了「狼來了」之後，竟然引起了各種出他本人意料之外的反應，相信他多少會感到有些後

悔。與其等到事後才來後悔，何如當初編輯在事前去勸止他呢？

另一個編輯不惜才的例子：「人間」（六七、八、二三）發表了莊因先生的「唐詩與漢堡」。這篇文章至少暴露了兩個問題：

（一）莊先生曲解唐詩：任何泛泛學習或深刻研究唐詩的人，不論他是中國人、日本人或歐美人等，都難以同意莊先生對唐詩判罪式的武斷說法。莊先生說：「再就深一層言，唐詩代表的是：封閉、保守與排他。」

最近，美國有一位文學教授史蒂格來臺灣觀賞中國文物。史蒂格博士一門三代都是文科教授，他本人由於家學的機緣，曾在英美著名大學，例如英國牛津等前後讀了三十年的書，獲得九個文法史的學位，他在美國研究並講授中國文化，也有十幾年以上的歷史。有人問他對中國最醉心的是什麼？他說：文物是青花瓷器，文學是漢賦和唐詩。他個人尤其欣賞李賀詩的造句精微，藝術高超，想像奇突，意境特別超越，十分「現代化」。

史蒂格博士認為唐詩不但沒有羈絆唐以後的中國

詩人，反而給其後人許多創意的誘導。他引李賀的「踏天磨刀割紫雲」、「黑雲壓城城欲摧」……等新奇具有鋒芒的詩句，來說明唐詩對現代詩人的啟發。……

莊因先生認為由於唐詩的「大備大臻」地位，所以，他把唐詩看作是束縛唐代以後中國人詩詞創作的鎖鍊。他說：唐以後的中國人都「不能跳出其窠臼」，一直到民國，才有「新詩」或「現代詩」誕生。難道莊先生不知道早於我們近千年的宋朝文人，已經够「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」（語見「人間詞話」）。於是有了浪漫自由、艷麗清新的宋詞燦爛開花的效果？

元曲、小令，又是中國文學的另一項突破。唐詩豐潤了後來的宋詞和元曲，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，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功勞。這些恐怕都是莊先生要避而不論的。

（二）莊先生不懂漢堡（包）（hamburger）……我這樣說，一定有人不服氣，難道莊先生滿肚漢堡，還不懂漢堡嗎？

「失樂園——汽車工業世紀的沒落」一書的作者，盧愛瑪女士（Emma Rothschild），寫過一篇

文章，取名「讓他們吃漢堡」。假如莊先生讀過這篇文章，可能就不會偏激地鼓吹：「漢堡呢？它所代表的固是其物質上的意義，可是也自有其精神上的一面，那就是代表了開放、進取、兼並包容。」

盧愛瑪女士從事觀察美國人吃漢堡得失的時間，從一九四〇年以迄一九七〇年代，足足涵蓋了三十年之久，她的結論是美國人漢堡吃得太多，結果失多於得，她很悲憤地嘆息：「……事實上，多吃牛肉漢堡，並不顯示美國人的健康比別國的人更好，也不顯示美國人的財富比別國人更多。」她對鼓勵多吃漢堡的人痛下針砭，語重心長……。

不過，有失亦有得。我們從莊因先生的大作，倒可以明白一件事：原來猛塞漢堡，也會收到洗腦的同等功效！共產黨施行洗腦，強迫改變一個人的思想，被普天下愛好自由的人嚴正指責。可是，「漢堡文明」對我國留美的知識份子，像北平填鴨一樣塞填漢堡，居然也會發生洗腦的作用！使得被塞滿漢堡的中國人，反過頭來向國人熱誠地推銷：「我們的確需要製作漢堡，推廣漢堡，使之成為老少咸宜食物的那套科學精神！」

一位負責任而惜才的編輯，就應該獻言莊先生，不必發表對所論文章的主題，既不懂西方文化，又歪曲東方文化的大作，而略盡一點惜才的責任。

三、充滿信心：作為副刊編輯，必須充滿信心，千萬不要輕易被杯弓蛇影嚇住。文章既經發表，引起反響應是求之不得的事，副刊編輯應有充分的信心，提供雙方相等的機會，讓辯難雙方有公說公理、婆說婆理的機會，以免拑負壓制一方言論的咎責；當然兩位作家互相批評會沒完沒了，浪費了副刊的篇幅，但是如果編輯有相當的技巧，自然能夠調節雙方的辯難，做到適可而止的地步。

這裏倒有一個很好的例子。「人間」刊登了馬逢華先生批評顏元叔先生的文章，經顏先生答辯之後就中止了。馬先生預先聲明：「跳探戈舞，必須成雙」，表示比畫一個回合後，就不再交手了。這實在是一個範式性的前例，可供編輯作為安排論辯時的參考。

編輯如只走獨木橋或單行道，便是虎頭蛇尾，缺乏信心的畏縮行爲。我們的國家和社會，確實是相當正常健康的。許多人雖然和而不同，但是大家對建設三民主義社會的大目標，總是一致的，犯不着一定要

所有的人來個同而不和的單部大齊唱。雖然有少數的投機分子，爲了表現個人英雄主義，興風作浪，引人注目，到底是經不起耐久考驗的，譁衆取寵，並不足以動搖健康社會的根本，這就是編輯必須充滿信心的原因。

四、充實識力：「聯副」曾連載陳紀澄先生的「創作」小說「華裔錦胃」，其中前言後語，滿嘴愛國言詞，令讀者十分感動。不過，全書各節的精粗極不平衡，書中精采的各節，歷史背景踏實，描寫百年前華僑被賣豬仔到美國做苦工，參與美國開闢大規模橫貫鐵路，處處表現出中國人的刻苦精神，血淚斑斑，讀來令人驚心動魄，引起讀者猛然深省和警惕的情緒。書中粗疏部分，則是前後對照不上，缺乏各種科學及軍事常識，顛顛倒倒，錯誤百出。後來，陳先生集會宣佈，這篇長文被人評指有抄襲之嫌，因而致使陳先生與人打上官司，構成與「誹謗韓愈」半斤八兩的「文字刑」。陳先生在法庭親自作證說：「聯合報連載的，是我的未定稿！」原來如此：「未定稿」一詞，關係重大，這是當時官司勝負的關鍵因素之一。

編輯的識力不足，而又懾於成名人物的威勢，才

會花幾個月的時間去連載「未定稿」，誘使成百萬的讀者掉入陷阱。恕我坦率地直言，就新聞道德而言，這實在罪過。

編輯的識力不足，還會造成更大的遺憾。這種實例不少，我無法一一直舉，只取譬略爲說明。

例如有一個女人，爲了同情一個不幸的男人，諸如受傷的戰士、病人或囚犯，因而替他服勞奔走，甚至傾囊資助，使他得以早日康復，或恢復自由。她由同情而生愛情，而他却只感激她的同情和實際幫助，無法強迫自己虛偽地去接受一份本身不起愛意的愛情。……於是，她寫小說「審判」對方，因而贏得了無數讀者的共鳴，同聲譴責對方的忘恩負義、薄倖無情。這種「小說審判」的手段是不公平的，因爲那使得對方全然沒有申辯的餘地。

把這個例子的性別反過來，某男士對於那個使他在情場上栽跟斗的女人，也可以露那麼一手。他深恨「我愛嬌嬌」，奈何「嬌嬌情鍾他人」，於是也寫小說「審判」對方。如果編輯欠缺識力，遂使小說家得以利用副刊，極盡其「我不下他（她）於地獄，誰下他（她）於地獄」的權威。報紙的一般讀者羣中，每

多情緒高昂之士，往往視小說「審判」家爲社會大眾的代言人，小子羣起鳴鼓而攻之，迫使被小說「判罪」的人，永世不得超生。

這種事情，在法治水準高的國家中，是絕對不容許發生的。一個尊重法治的國家，法律一定嚴格禁止「小說審判」，莫說小說中被「審」的主、配角不得涉及真實姓名，連影射也在嚴禁之列。我國法治觀念比較薄弱，編輯又往往限於識力，不足以分辨是非，致使用小說審判他人的作者，得以利用副刊版面洩其私怨，而被審者有口難辯，徒呼奈何！

副刊編輯的四不充

一、不充作內行：這應該是雙軌的要求。一方面要求編輯不充作內行，另一方面，編輯也要嚴防作者，尤其是名氣大、足以左右讀者思想的作者充作內行。

夏元瑜教授的「大驚小怪看按摩」（「萬象」六六、一一、六），引經據典，證明「馬殺雞」在我國自古相傳，叫做「推拿」，又叫做「按摩」，英文叫做 Massage，夏教授把古今中外的學問全都用上了。

然而，夏教授學問雖大，也有不明白的地方。他說：「更不明白按摩院既可公然營業，爲什麼理髮店不許按摩呢？」

如果夏教授真的不明白臺灣的「馬殺雞」實際上是什麼玩藝兒，那他又何必大驚小怪去「看」呢？難道報紙的社會新聞，常常登載警察抓到經營「馬殺雞」的人，和享受「馬殺雞」的人，都以違警罰法處分，是警察違法抓人嗎？

夏教授又說：「中國不禁娼，可是取締 Massage。美國正相反，禁娼，而應召女郎和街角女郎特多。」夏教授似乎不知道，我國取締的是土式的色情「馬殺雞」，而不是洋式的真正 Massage，這根本是兩碼子事。他更不知道，美國的應召女郎多與少是另一回事，但應召女郎與「街角女郎」是犯法的。不過，美國的法律對證據要求甚嚴，警察不容易抓到她們確實的把柄罷了。如果有證據，就照抓不誤。

夏教授以「馬殺雞」辯護士的口吻指責報紙：「即令有些蛛絲馬跡，也不值得報紙宣傳，神秘其說。」難道他真的不知道「馬殺雞」對臺灣的色情污染，已到了何等田地？曾正覺先生在香港的「新聞天地」

雜誌呼籲「如何整潔臺灣的色情污染」，他慨嘆這些色情事兒普及全省，臺北乃此之冠。曾先生對「馬殺雞」，有一首打油「釵頭鳳」描寫如下：

「八寶粥，香烤肉，一回生來二回熟。宮牆柳，湘妃竹；妾身分明，也可私淑；速，速，速！」

他又說：政府「祇是沒有大氣魄的長程根治之計，所以好比水底按葫蘆，按下了這個。那個又冒起來，手一鬆，連這個也冒起來了。」（「新聞天地」六七、九、二）

我們的「馬殺雞」的辯護士連按葫蘆也不以為然，真不知他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？「馬殺雞」的色情勾當，連香港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了，為何身為臺灣多年的夏教授竟「看」不見呢？

夏教授大驚小怪的對「馬殺雞」充作內行，編輯竟視若無睹，真令人有點「大驚小怪」。我們只好一笑了之。可是，最不可忍的，夏教授竟搬出亞聖孟子的神牌，怪別人偽道學。他說：「孟子說過，食色性也，才是直言無隱的亞聖，並不是偽道學。」最後，夏教授索性擺起擂臺來，向讀者挑戰說：「那麼，舊學還不如我了。」

打擂臺倒不必要，但也不應怯於檢證一下夏教授的「舊學」。

請夏教授翻一翻任何版本的「四書」，在「孟子」的「告子上」篇，明明印着「告子曰：『食、色，性也。仁，內也，非外也；義，外也，非內也。』」孟子還反問告子：「何以謂仁內義外也？」……只憑這一點，夏教授還好意思說別人的「舊學還不如我了」嗎？

桑科先生在「人間」發表「古典詩的數學箋注」，曾被李魁賢先生「揶揄」分析了一番。請看：

「試以桑科箋注陸放翁『梅花』詩：『何處可化身千億，一樹梅花一放翁』為例，其箋注之前半為：

身千億

身 × 十 × 億

身 × 十 × 億

身 × 十 × 億

若以符號代替，可改寫成為道地的數字程式，則

$$\text{爲} \quad A = A \times B \times C = \frac{A}{B \times C}$$

這是完全不通的邏輯。……（「筌」六七、八、一五）

據說桑科先生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文學教授，可惜他捨長就短，越位去攪數學；本來分明是一個內行人，偏偏要充作外行去討好讀者，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！

二、不充斥熱鬧：「人間」曾舉辦「洪通參與」，造成一時的大熱鬧。引得大家狂捧洪通先生，說他是我國的畢加索，我國的薩格爾；也說他是鄉土藝術家。畢加索和薩格爾都不是鄉土派，這兩種比喻，自加矛盾。唐文標先生曾高呼：「南鯤鯓，敬禮！」可是，一場熱鬧過後，捧洪通先生的人，風流雲散。「洪通」是「畢加索」也好，是「薩格爾」也好，到頭仍舊還原洪通，依然貧病交迫，依然任太太在廟前賣香燭，賺點蠅頭小利來養活他。記得尉天驄先生說過：「城裏的有閒階級也許以為藝術家高於一切，但是，對於一個努力奮鬥的社會來說，最需要的還是苦幹實幹的人。」他特別指出：「如果洪通沒有他那辛苦的太太做工養活，恐怕早就無力做畫了。」其實，真正的藝術家，也是具有生產力的。如果「洪通」果然是「畢加索」或「薩格爾」，或「鄉土藝術家」，在那麼一陣熱鬧之後，他還得要靠那貧苦的太太做工來

養活，那麼當年熱鬧捧場的人，捫心也應該有愧吧。

三、不充塞框框：近來，副刊的框框越來越多了，令人不禁聯想到美國工商社會的「廣告文化」。美國許多刊物，早就淪為商業廣告文化的附庸，廣告才是主題。因此，許多商業藝術家絞盡了腦汁，為的是替廣告設計賞心悅目的圖畫，寫廣告文稿的人，也搜斷枯腸去想出誘人的詞句，去刺激讀者對各類新產品或聲色犬馬等娛樂的慾望。刊物中的文章，先由編輯設計好了許多框框，授意攢稿費為生的職業寫家，按既定的篇幅去填寫。

能够迎合老闆的胃口，主編和一些用眼不用腦的「現代」讀者的趣味，乃是「廣告文化」支配下寫家最高的技巧。這樣下去，文化界遂產生了反淘汰的惡果。任何鼓勵獨立思考，作家言之有識的刊物，不論它對社會會有多麼大的貢獻，不論它的歷史多麼悠久，一旦遭逢「廣告文化」的侵襲，都逃不過被迫關門大吉的劫運。請看美國的「星期六晚郵雜誌」、「展望雜誌」、「生活雜誌」（註二）等都先後忍痛停刊，就是最令人警惕的教訓！

「聯副」和「人間」的框框實在太多，不勝枚舉

，只引一兩個個談談。

譬如「新聞詩」，分明圈窄了詩人創作的道路，還說把它拓展，詩人在框框裏填詩，好比孫悟空在如來佛掌中翻跟斗，翻來翻去，翻不出五指山的範圍。何況，框框詩填多了，只顯出詩的形式，詩人的性靈被緊頭箍箍着，日漸枯萎，終於把所謂「這一代的風、雅、頌」，變成分行印刷的新聞。

「人間」出現了一個文學和科學結親的「插嘴」，第一位作者一上來就宣告不上臺，所以也不會被轟下臺。看來這個框框似乎是很安全紮實的，不料竟遭到「插嘴」的「插嘴」，才發覺古典文學和現代科學兩頭不討好，臺上和臺下兩邊不落腳。

四、不濫竽充數：倘若副刊能够經常刊登介紹「學術」意味的文章，自然很好，如果缺乏這類文稿，便不宜強行拉稿，不如寧缺勿濫。

讓我們看看「人間」的「中軍衛隊與車馬大陣」和「三墳三泉始皇陵」（六七、六、二二—二三）不難發現這兩篇做考古報導的大文，不無濫竽充數之嫌。

這兩篇圖文並茂的文章，在文末說明「部份資料

圖片取材自今年四月之『美國國家地理雜誌』」。作者夏元瑜教授在第二篇最末一節——「萬世罵名」中，義正詞嚴，斥責中共說：「中共雖然崇秦，可是也正在打算掘他的墳呢！」其實，中共早於年前已經開掘秦始皇陵，初步掘得了若干文物，並且假手 Audrey Topping，撰文取題「中共令人難以置信的發現」，在「美國國家地理」雜誌，作親身經歷式的宣揚。夏教授決不是不知情的。我認為凡是在中國大陸出土的文物，都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遺產，不管那些文物目前是否暫時落在中共手中，我國任何學者，都可以根據學理去公開討論、分析、乃至批判。可是，論述的態度必須認真莊重，決不能像夏教授那樣，將 A. Topping 的文章任意「取材」拼湊成篇。

夏教授摘譯 A. Topping 的文章，真是煞費苦心，經過了一番很工心計的剪裁，然後再重行編排。最難得的是他添加了一幅驪山圖和一些別的文字資料，以符合「部份資料取材……」的按語，並且在全文結尾，附註一句：「本文內幾張國畫的圖是楊先生先生的手筆，特此申謝。」真是禮多人不怪。未知夏教授是否已去函致謝？既是如此，夏教又何必厚彼薄此

，應該也向 A. Topping 表示謝謝她代夏教授提供資料的汗馬功勞才對。

夏教授運用「錦上添花」的手法，來成全他兩篇大作的「學術」地位，但亦免不了有許多疏漏的地方。這裏只舉兩個例：(一)例如第一篇的第四幅圖，明明是四匹陶馬的碎片，怎麼會變成戰車碎片呢？(二)在「美國國家地理」雜誌第四五〇——四五二頁，楊先民在一幅大圖中央畫了一幅有比例尺的「秦始皇陵位置圖」，右邊畫了「始皇帝陰間部隊圖」，位置標明在皇陵東側。左邊畫一幅中國大陸圖，藉以標示出驪山的位置。夏教授把「皇陵位置圖」和「始皇帝陰間部隊圖」分了屍，一幅放在第一篇，另一幅放在第二篇，又索性將驪山位置圖減跡，並在改造的皇陵圖上，多加了一個莫明其妙的「墳堆」名詞……真是弄得他本人和大家東南西北的方向都攪不清楚了。

中共借 A. Topping 之手寫文章，又運用楊先民來繪圖，正是中共在「文化統戰」中利用國際合作的「間接戰術」來增加宣傳效果的有意安排。我們不可以因為中共拿出土文物做文化統戰的武器，就忌諱避免去談它。如果我們能够充分運用學術條件，那些

出土的文物，也成為我們最有力的反統戰武器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我們不能草率剪貼，自封權威，落人恥笑。

副刊的花樣不怕多，但決不能為了構成多采多姿的什錦拼盤而濫竿充數。

結語

許多人以爲，「第三類接觸」是「意外的意外」，其實不然。這好比觀賞木偶戲，臺下觀眾看見木偶那麼生動活潑，能够發揮種種可愛的表情，自然會有意外之感。木偶本身，按照劇情，明明應該向前踢腳，那知一脚踢過去，却踢到左邊，自然也覺得意外。可是，演木偶戲的人，一手安排並牽動着所有的「意外」，所以，不論多少類接觸，也都是他的「意料中事」。

副刊的框框太多，作家不得不套入框框裏去發揮筆意，任人擺佈慣了，日久性靈汨沒，淪爲寫家。

王國維先生在「人間詞話」中說過：「詩有題而詩亡，詞有題而詞亡，然中材之士，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！」副刊有而且多框框而文運衰微，實在令人



最近由於負起了編副刊的任務（編按：民衆日報副刊），所以有關副刊的問題時時縈繞腦際。

年來，「聯副」與「人間」奇招百出，

副刊的問題

鍾肇政

花樣翻新，多年來的副刊的傳統形貌，已遭到全面性的改革，連帶地似乎也推動了其他多種副刊的求新求變的風氣。無可懷疑，副刊已面臨變革的時期，副刊之必需負起更多的責任，似乎已是無可迴避的趨勢。

憂慮！

如果有人問，爲何這樣想呢？試看一看：副刊是天下公器，這公器散佈框框污染，幾乎遍及所有有志於寫作的人士，使多少上、中、下材之士，自甘伸頭套入框框，而「鮮能知此而振拔」，長此以往，那裏還有寫作自由的思想？都裏還有品格獨立的文人？

就拿我寫這一篇文章而言，還不是編輯攪專題，而我應命依題而寫的吗？我不是自甘墮落，却是活在這污染的環境中，材識不足而不知振拔而已。實在萬

分慚愧！不過，身爲副刊讀者，我倒樂意奉獻愚者一得，盡點「啄木鳥」的責任，但願這兩家報紙的副刊編輯能够寬宏大量，接受我這篇「國王的新衣」式的察病直言。

「註一」：正如金耀基先生表示，傳統與現代化是很複雜的問題，容日後有機會再詳細討論。

「註二」：報載「生活雜誌」已於九月廿四日復刊。